

社会抚养费的前世今生

9 月 18 日，审计署分别通报了重庆、甘肃、云南、四川、陕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北 9 省市(每省市 5 个县，共计 45 个县)的社会抚养费审计结果。初步统计，45 县向征收单位和计生部门违规拨付的社会抚养费，总金额约达 16.27 亿元。932 万社会抚养费挪作奖金补助。

社会抚养费是中国特有的一项行政收费。在 1980 年代初期叫“超生罚款”，随着中国法制的健全和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政府认识到计划生育是一种倡导性义务，对于超计划生育不宜给予行政处罚。200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文统一改为社会抚养费。之后，200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明确了社会抚养费制度。2002 年国务院又制定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

根据我国《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

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这种宽泛的定义就赋予了各地方计生委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导致各地区社会抚养费的缴纳标准严重不同。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当时国家计生委的官方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社会抚养费的用途是什么？在 2002 年《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出台前，社会抚养费被规定全部用于补充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费的开支。《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实施后，上述经费支出要求出自财政，而社会抚养费也被要求全部上缴国库。但在实际计生工作中，乡村所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先上缴国库，然后县政府再返还乡政府，返还比例不一，一般是 70%或 80%，最高可达 90%。

2009 年，有网友公布了一个镇计生服务站的社会抚养费支出分配：总计 191 万元，11.5%上缴镇政府，21%用于职工工资，0.42%用于独生子女奖励，0.25%用

于手术服务费（这本应是大宗，却不足 5000 元），余下那些钱，则列为“其他支出”。不便明示，则一笔带过。

今年 7 月 11 日，浙江碧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有水向全国 31 个省级计生委、财政厅(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根据部分回复并公开了的省份数据估算，全国这一费用每年的征收总额为 200 亿元左右。这笔费用究竟都用在了何处，是否投入了社会公益事业，补偿了多少社会资源，没有人知道。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表示，社会抚养费是要上缴到财政的，但是至于财政怎么拨款，拨了多少给教育等，公众看到的，也是一笔糊涂账。

实际上，社会抚养费成为不少区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国社科院一位专家曾表示，有些地方，征收的社会抚养费除一部分用于计生工作外，还包括镇村干部的奖金、村里的分成，有的用于养老保险，有的用于办公费用，对比例的规定也十分“灵活”。有媒体记者在采访期间，也听到了“市县靠土地，乡村靠生育”的说法。

这从根本上违背了设立社会抚养费

制度的初衷。对超生者及其家庭而言，“社会”从未尽到抚养的义务，这笔费用也没有用于补偿公共资源，倒像是他们向权力者缴纳的人头税。而对于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失独家庭”问题、30 年不涨的独生子女费等明显与计生国策有关的民生重点，社会抚养费制度却未体现出其补偿作用。

早在 2011 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王名、刘大钧，在经过调研和征求多位人口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联名提出《关于停止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案》。认为巨大的征罚力度和执行的强制性，让弱势群体陷入赤贫绝境，促富人、精英移民，导致财富和人才外流；并导致一些严重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现象，还因性别选择加剧日益严重的性别比失衡现象，使拐卖儿童犯罪日益猖獗；同时还是加剧社会不公的重要因素；也因征收标准多重、自由裁量空间巨大，极易滋生腐败，加剧干群关系对立。

今年 2 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 年法治蓝皮书》建议，逐步取消社会抚养费制度。

《青年商旅报》2013.9.13 文 / 王俊秀

林彪死后毛泽东为何不让周恩来接班

林彪事件使毛泽东的接班人出现了空缺。除了年龄稍大外，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周恩来都应该是众望所归的接班人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周当作接班人考虑。其原因，是他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表现得“右”。毛泽东担忧的是，他死后周恩来会否定他的“文革”路线。因此，1973 年，毛泽东提出了实际是针对周恩来的一系列批评。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批评

1973 年 6 月 25 日，周恩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指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按照周恩来“这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的指示，由外交部讨论，副处长张再执笔，写成了一篇文章《对尼克松——勃烈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 1973 年 6 月 28 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 153 期上，文章认为美苏签定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7 月初，王海容、唐闻生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问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新情况》写得不错，是根据周总理意见写的，你给毛主席读了吗？张说没有。于是唐便给毛读，不料毛听后提出异议，还举例说明简报的分析错误，说是“放屁一通”。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几乎相等，出现了一种相持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共同主宰世界，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是两国更加尖锐的斗争。历史发展证明，美苏之间的联合主宰是暂时的，对

立是不可调和的，直至苏联瓦解。毛泽东表现出了更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

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情况后，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诚恳地承担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7 月 4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王洪文、张春桥及两个女翻译王海容、唐闻生进行了一次谈话，仍然针对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提出批评。

“批周”会议风波

11 月 10 日，上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了他的第六次访华。基辛格走后，翻译王海容、唐闻生拿着周、基最后一次会谈的记录稿，将划有杠杠之处念出来，问周恩来：“您是这样讲的吗？”周回答：“对，这是记录稿嘛，我就是这个意思。”

唐说，那就怪了，这么大的事，总理为什么不请示主席，也没和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就急忙去见基辛格，答复建立核保护。

11 月 17 日，听了两位女翻译汇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同基辛格的谈判中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雷霆震怒”。毛泽东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拍案而起与之争辩：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江青冷笑着说：走着瞧！

11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

毛泽东的指示：要开会批评周恩来和以前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的叶剑英的错误。会议中，江青和张春桥等人肆无忌惮地批判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范围继而上升到权力之争。江青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是“错误路线的头子”。与会者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周恩来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本人进行了过分的自我检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12 月 9 日，毛泽东指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他还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我，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了。

但是，毛泽东既然肯定了“批周”会议，周恩来面临的态势就不可能马上得到改变。对周恩来的“批评”被扩大到了相当广泛的范围。

1974 年 2 月 22 日，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后，对陪同接见的周恩来问：总理，你怎么样了？周恩来回答：还可以。没抓好大事。毛泽东笑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周也笑了：没有。

这年夏天，毛泽东会见外宾，因为沙发不够，周恩来便坐到椅子上，把沙发让给女翻译。毛看到了，对外宾说：总理可怜哪，被这些娘们整得这个样子。

中国网 2013.9.5 文 / 陈东林



赫鲁晓夫当众脱鞋子

中还说，由于赫鲁晓夫的鲁莽行为，“苏联代表团受到罚款处罚”，至于罚款的数额，“有人说上百万，甚至更多”，而“最可信的消息来源说是一万美国”。

《新闻午报》文 / 王正泉

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被罚万元

赫鲁晓夫在从事国际活动时，常常口不择言，鲁莽行事，给世界落下许多笑柄。其中最有名的是，赫鲁晓夫出席 1960 年联合国大会，有一天他在辩论中情绪失控，从脚上脱下皮鞋猛敲桌子，并同西班牙代表吵得几乎动起手来……

当年在离开莫斯科去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伊巴露丽请他帮一下忙，要求他“寻找一个机会让佛朗哥政权丢丢脸”，因此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殖民主义问题发言时，强烈谴责了佛朗哥“反动的、残暴的政权”。而当西班牙代表上台进行答辩时，苏联代表团“开始大声叫喊地吵起来”，赫鲁晓夫“甚至脱下皮鞋来敲桌子”。赫鲁晓夫承认，他采取的是一种“不合法会

规则的做法”，后来成了“笑话”。

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也是一家报社的总编辑，对此有更精彩的说法。阿朱别伊在 1961 年 10 月苏共二十二大的正式发言中说：“当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发出了侮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挑衅性言论时”，苏联代表团就鼓噪起来，“用拳头敲着桌子以示抗议，拳头累了，便找其他方式来制止那些伪君子 and 骗子”。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在其著作《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中写道：当时，赫鲁晓夫手里拿着“一只橡胶底的便鞋”，“环顾左右，微笑着，开始用后跟敲打桌子”；“渐渐地，赫鲁晓夫加快了速度，他需要引起‘观众’的注意”；后来，他“使劲用鞋后跟敲打起桌子来”。书

香港回归后英大批特工渗入政府

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务大臣施维尔日前在港媒上撰文，称英国随时准备为香港普选提供支援。此事暴露英国干预香港事务“已赤膊上阵”，令各界哗然。为警示香港市民，有港媒日前揭露了自回归以来英国在香港进行的大量间谍活动。

据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媒体 16 日报道，英国情报机构在香港的活动，不仅没有在香港回归后消停，反而不断加强。众多退役、现役的英国军情六处驻港特工，有的以领事身份，有的以经济文化等部门职员身份在港服务于“英国的需要”。他们的“行动中心”，目前位于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内。该馆于 1996 年建成，其设计者为英国建筑师泰瑞·法雷尔，此人正是军情六处总部大楼的设计者，深谙情报机构建筑的游戏规则。

报道称，早在 1984 年《中英联合声明》落实香港主权于 1997 年归还中国后，港英情报部门“政治部”就部署变身，由官方转为非官方、由地上转为地下。在回归前数年，就在港英政府保安科下设神秘 D 组，实际上是个小型的军情六处组织。香港回归 16 年来，该组织不断在香港进行渗透与间谍活动，对香港特区政府乃至中国政府造成严重威胁。

《大公报》称，与美国“依赖高科技”相比，英国情报机构更注重“人的资源”，即十分注重对关键人物的收买与策反，“放长线钓大鱼”。为了达到目标，长期盯住关键人物，时间可以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正是这种情报运作方式，令英国当局可以在十分低调、不易被察觉的情况下，获取大量核心情报。此外，英国情报机构在香港还有一招“杀手锏”，即拥有大量政府高级公务员的绝密资料，包括个人污点、个人升迁轨迹等等。通过此类数据，长期控制着一批港英过渡的高级官员。前发展局局长麦齐光因骗领房屋津贴被控，但所有指控证据是源自数十年前的公务员资料，拥有此等能力的，应该只有英国当局。

《文汇报》称，香港回归 16 年来，一大批隐蔽身份的军情六处特务回流香港，渗入政党、团体、司法界、商会、传媒、政府要害部门，抢夺香港管治权。针对英国在港的间谍活动，《大公报》提醒说，香港市民对此需保持清醒认识，更要保持警觉，如果国家利益因此受损，香港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环球时报》2013.9.17 文 / 凌德